

中国农村发展的度量指标

——基于能力路径的研究

李 石 杨 刚

摘 要 阿玛蒂亚·森等学者提出能力学说，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人的能力的提升。联合国在能力学说的基础上设计出人类发展指数，以评价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从能力学说的视角出发，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具体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应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借鉴能力学说的核心思想，结合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现状，从基本生活、情感维系、公共生活和个人发展四个维度制定出评价中国农村发展的度量指标，将有助于农村人口的能力发展，为消除“绝对贫困”之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构建适当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 能力路径 基本生活 情感维系 公共生活 个人发展

作者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2）；杨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博士后（北京 100006）。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7-0094-8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农业、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消除绝对贫困，尤其是消除中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这是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成果，同时，这也给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具体目标，建立什么样的指标体系对发展成效进行测度和评价？本文尝试借鉴阿玛蒂亚·森等学者提出的能力学说，结合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现状，针对中国农村地区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度量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标，以期消除“绝对贫困”之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构建适当的评价体系。

一、文献回顾

在农村发展指标的设计上，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比较高，所以专门针对农村发展而设计的度量指标较少。因此，本文主要介绍国内学者设计的中国农村发展度量指标，并参考国外学者针对广义的社会发展而制定的指标体系。

（一）国内研究进展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关于中国农村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针对农村发展的具体方面，从经济、农民生活质量、生态或教育等具体层面构建的指标体系。例如，李晔等人在对河南省农村经济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生活水平、生产条件四个维度构建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① 张婷婷的研究关注农民的生活质量，主要从农民收入与结构、农民家庭生活、农村保障和安

^① 李晔等：《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4期。

全、农民闲暇生活、农村生态环境五个层面 13 个指标构建了农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① 而曹连海等人将研究视角聚焦到农村生态环境上,从农村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生态功能和协调度三个方面来构建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② 还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农村的教育发展指标,秦玉友和袁桂林的研究就是从横向的教育类别、教育要素和纵向的教育层次、教育发生构建了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指标体系。^③

二是构建涉及农村社会多领域的综合评价体系。例如,李秀霞和刘雁提出了“4+X”型的农村发展评价体系,该体系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以及地域特色几个部分。^④ 刘辉和王征兵构建了农村均衡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该体系包含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人口质量和资源环境四个层次,共划分了 21 个指标。^⑤ 申云和李京蓉则是从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两个维度,结合不同维度的内涵划分为 16 个细分指标,尝试建构农村居民生活的富裕指数。^⑥ 田亚平等主要根据新农村建设的农村要求,构建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为一级指标,涵盖农民收入、住房、集体福利、教育、村级民主政治建设指数等 27 个二级指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⑦ 闫周府等人则是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和专家打分法构建了一套由 5 个一级指标、21 个二级分项指标和 43 个三级分项指标为基础的动态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中国各省、区、市之间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⑧

三是从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贫困问题入手,建构评价农村发展的指标体系。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关注并不仅限于财产和收入,通常是从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来综合评估人们的贫困状况。目前,多维贫困已经成为探讨贫困问题的共识。国内关于多维贫困的研究,大多参考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及指标,并借鉴“Alkire—Foster”测度法进行测量。例如,张全红、周强利用 1991—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等四个维度计算 20 年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指数。蒋翠侠等人从饮用水、收入、教育、健康保险、电器等五个维度对中国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发现,收入、教育和水是导致中国居民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且农村的多维贫困远大于城市。^⑨ 李小云、李周等人构建了人均年粮食产量、人均年现金收入、人畜饮水条件、女性长期患病率等涵盖了生活、生产、卫生教育三大维度 8 个指标的参与式贫困指数,革新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测量方法。^⑩ 李飞则是对中国 9 个村的农户贫困状况进行考察,从收入、教育、健康、住房和社会关系等维度对贫困问题进行测度。^⑪ 李佳路的研究也是尝试从收入、环境卫生、教育和健康等维度对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显示,环境卫生、教育、健康等维度的贫困越加凸显。^⑫

(二) 国外研究进展

许多国外研究者试图超越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一般性的评价和测度。这些学者设计出评价人类社会状况的多种指标体系,这些文献资料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指标设计具有借鉴意义。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PQLI)、“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① 张婷婷:《构建江苏省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 年第 4 期。

② 曹连海、郝仕龙、陈南祥:《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水土保持研究》2010 年第 5 期。

③ 秦玉友、袁桂林:《农村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建构的理论问题研究》,《中国教育学刊》2007 年第 12 期。

④ 李秀霞、刘雁:《社会主义新农村评价体系研究》,《农村经济》2006 年第 11 期。

⑤ 刘辉、王征兵:《农村均衡发展指数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实证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⑥ 申云、李京蓉:《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视角》,《调研世界》2020 年第 1 期。

⑦ 田亚平等:《新农村建设的村级评价指标体系——以湖南省衡南县工联村为例》,《经济地理》2007 年第 3 期。

⑧ 闫周府、吴方卫:《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经济学家》2019 年第 6 期。

⑨ 蒋翠侠、许启发、李亚琴:《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统计测度》,《统计与决策》2011 年第 22 期。

⑩ 李小云、李周等:《参与式扶贫指数的开发与验证》,《中国农村经济》2005 年第 5 期。

⑪ 李飞:《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方法和实证分析——基于我国 9 村调研数据的分析》,《广东农业科学》2012 年第 9 期。

⑫ 李佳路:《农户多维度贫困测量——以 S 省 30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财贸经济》2010 年第 10 期。

Indicator, GPI) 以及“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①。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是由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的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等人在 1977 年提出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状况的测度方法。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由婴儿死亡率、1 岁预期寿命和基本识字率三个指标组成,其中,婴儿死亡率是指每千个新生婴儿活不到 1 岁的死亡数,1 岁预期寿命是指活到 1 岁的婴儿最终寿命的平均值,基本识字率指的是 15 岁及以上人口中识字人口所占的百分比。^② 该指数的计算方式是三个指标的指数之和的平均值。莫里斯认为,这三个指标不具有特定价值观的偏见或歧视,能普遍反映人们的基本需要和愿望。该指数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有效评估美国的海外援助项目,测量贫困国家或地区的生活水平,却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和认可,成为度量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新方法。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也被认为是一种衡量社会发展的综合方法。^③ 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端,例如,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两个指标都反映了人们的健康状况,这也就意味着物质生活质量指标只是从健康和教育两个维度衡量地区发展状况,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福利状况。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代莉(Daly)等人于 1989 年所提出,其测度指标体系中包括了消费支出、收入分配、固定再生产资本存量、家庭劳动价值、自然资源的消耗及外部性价值等方面。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的具体测度方法是以个人消费支出为基础,逐渐增加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产生福利的指标和扣除自然资产折旧、环境污染等减少社会福利的指标。^④ 正是由于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综合考虑了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因素,还权衡了社会成本、未来成本以及社会分配等问题,使其被广泛运用以测量一国或者地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水平。如基斯(Gis)和斯莱辛斯基(Sleszynski)对波兰可持续经济福利水平进行了测算。^⑤ 同时,学者们也不断地对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及其测度方法进行扩展和完善,例如,克拉克(Clarke)和伊斯拉姆(Islam)利用可持续经济福利水平测算泰国的福利状况时,将可持续经济福利系统重新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精神和生态五个维度,并根据泰国的实际状况添加了公共债务、社会腐败两个维度。^⑥

柯布(Cobb)等人在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真实发展指数。真实发展指数由环境、社会和经济三部分构成,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增长、家庭债务、公共基础设施、可支配收入等 12 项指标;社会因素包括贫困、收入分配、教育、预期寿命、失业、离婚、自杀、选民参与、志愿精神等 22 项指标;环境因素包括公园、水质、空气质量、石油天然气储量寿命、农业可持续、野生动物等 17 项。^⑦ 可见,真实发展指数反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福祉的总体趋势,也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完善信息来判断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福利水平。柯布等人使用真实发展指数最先对美国的状况进行测算,他们发现,GPI 比 GDP 更接近于美国民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感知,它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美国政府宣布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进步,而民众却感到日益沮丧。^⑧ 此后,学者们对真实发展指数不断地进行研究和讨论,并测度了英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的真实发展指数。^⑨

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学者关注了农村发展的问题,并针对相关国家的农村发展制定出具体的度量指标。例如,奥卡福(Okafor)根据尼日利亚农村社区的需求满足程度来评价社区的发展水平,他对农村社区需求

① 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基础就是本文重点讨论的能力学说,因此将有关“人类发展指数”的内容放到本文的第三部分“能力学说与设计思路”中进行讨论。

② David Morris, *Measu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ld's Poor: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 176.

③ B. K. Roy, "PQLI Measure of Development: A Study of Literacy and Basic Resources in India," *Geo Journal*, 10(1), 1985, pp. 75-81.

④ Daly H. E., Cobb J. B.,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the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⑤ Gis S., Sleszynski J., "An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for Pol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3(1).

⑥ Clarke M., Islam S. M. N., "Diminishing and negative welfare returns of economic growth: an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for Thail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1), 2005, pp. 81-93.

⑦ Clifford Cobb, Ted Halstead, Jonathan Rowe,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Summary of Data and Methodology*, San Francisco, Calif: Redefining Progress, 1995.

⑧ Clifford Cobb, Ted Halstead, Jonathan Rowe, "If the Economy is Up, Why is America Down?" *The Atlantic Monthly*, 276(4), 1995, pp. 2-4.

⑨ Andrade D. C., Garcia J. R., "Estimating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for Brazil from 1970 to 2010," *Ecological Economics*, (1), 2015.

进行了三重分类,其中包括:(1)基本需求(如食物、水、住所、人身安全);(2)精神需求(如健康教育、就业、平等、政治参与);(3)一般的和社会的需要,例如道路、停车场、工业、教堂、清真寺、电视收视率、电力、社区大厅。^①奥卡福提出的指标体系试图从基本需要的满足这一角度对尼日利亚的农村发展做出评价。

综观已有文献,首先,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没有针对农村发展问题设计出相应的评价指标,即使有些研究考虑到了农村发展的情况,也没有针对中国农村的具体问题建构指标体系。其次,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评价侧重于现金收入、农村产业结构、消费指数等经济指标,或者局限于生态、教育、社保等某一方面,很难具体而全面地考察农村人口生活的方方面面。再次,国内学者的研究通常是针对某一时期的某一具体政策而制定的评价指标,这样的指标具有时效性,很难在长时段内连续地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做出客观的评价。鉴于上述问题,本文尝试采用能力学说,结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各种具体问题,制定出具体的、全面的,能够在长时段内评价中国农村发展的度量指标。

二、能力学说与设计思路

阿玛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有关社会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领域也颇有建树。对于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森创新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一组概念:功能与能力。森论述道:“‘功能’(functioning)的概念(很明显它源自亚里士多德),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②简单来说,功能就是人们所处的状态和可以做的事情。森所理解的功能包括许多内容,从较初级的“保持良好的营养”“身着体面的服装”“接受义务教育”等,到较复杂的“在世界顶级的音乐厅欣赏交响乐”“实现环球旅行的计划”“成为候选人竞选总统”等,都可以被称作“功能”。“可行能力”的概念与“功能”概念直接相关,指的是“某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的组合”^③。在森看来,“可行能力”是一个集合,它包括了一个人可能实现的所有的功能。在构建了“功能”和“能力”两个概念之后,森认为,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就是人们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的提升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如果要“可行能力”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就必须进行“可行能力”的人际比较,以确定哪些人的可行能力强,哪些人的可行能力弱,以及如何推进可行能力的提升。这就要求研究者给出一个可行能力的“清单”,将那些要进行测度和评价的可行能力罗列出来。由此,森具体讨论了如何实现以“可行能力”为视角的人际比较的三个问题。第一,关于用于比较的“能力清单”,森否认有任何一种神奇的公式可以确定能力的清单,主张通过公共理性和民主参与的过程,挑选出不同的能力。森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列出能力清单,而是反对脱离具体的度量目标和历史文化背景给出能力清单。在森看来,度量的目的不同,对象不同,其选定的能力清单也会不同。^④第二,对于人们应选取所有功能进行社会评价还是仅关注一部分功能的问题,森指出有三种可能的方式:“全面比较”“局部排序”以及“突出的可行能力比较”。其中,“全面比较”要求对所有的功能进行比较,“局部排序”不要求评价性排序的完整性,而“突出的可行能力比较”则选出一些与所讨论问题相关的功能进行比较。例如,森在讨论贫困问题时,就选择了就业、预期寿命、识字和营养状况这几种功能进行排序比较。第三,对于“可行能力”比较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森认为,“可行能力”及其相关理论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只能以“可行能力”作为变量对公共政策和社会分配做出评价,“可行能力”比较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互补充的。除了采用“直接法”,直接应用可行能力比较的数据外;还可以应用“补充法”,在继续传统的收入比较的基础上,以可行能力比较作为补充;或者使用“间接法”,在继续传统的收入比较的基础上,以可行能力比较的数据对收入进行校正,算出“调整后的收入”。例如,为了反映可行能力的真实情况,残疾人“调整后的收入”会因其残疾所需的医疗费用而下降。在森看来,“补充法”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它能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人们之间真实的不平等状况。

① Okafor, F. C., “Basic needs in rural Nigeri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7), 1985, pp. 115–125.

②③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贻、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63页。

④ Sen A., “Capabilities, Lists and Public Reasons: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Feminist Economics*, 10(3), 2004, pp. 77–80.

在森的带动下,玛莎·努斯鲍姆和伊丽莎白·安德森等也尝试应用能力学说对社会发展做出评价。努斯鲍姆采用“客观清单路径”(object-list route),列出了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性、感知、情感、实践理性、依附、关爱动物、玩耍、环境在内的十种“核心人类能力”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①与努斯鲍姆不同,安德森反对直接给出能力的清单,她采用的路径被称为“准则路径”(criteria route)。亦即以“成为民主社会中的平等成员”为准则,并据此而确定人们的哪些“可行能力”应成为人们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②

由森、努斯鲍姆和安德森共同倡导的能力学说及其一整套方法不仅在理论界引发了热烈的反响,而且还推动了对度量经济发展之方法的变革。联合国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发展状况的测量就吸收了森的相关主张。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依据森的能力平等理论创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并从当年开始每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定期发布。具体来说,预期寿命用于衡量人们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准包括了成人识字率(占2/3权重)、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综合入学率(占1/3权重);生活水平则是使用人均GDP指标并根据Atkinson收入效应规则进行折算。“人类发展指数”包含了森认为重要的相关可行能力,而不是简单地以GDP或GNP来标识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相比之前的指标体系,人类发展指数更关注人本身的能力的提升。

三、中国农村发展的度量指标

能力学说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考察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中国农村发展的评价应聚焦于农村人口可行能力的增强,聚焦于人们生活质量的切实提高,通过测度个人的生活状况来对社会发展做出评价。针对中国农村地区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尝试采用安德森提出的“准则路径”,以“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平等公民”为准则;依据森阐述的“补充法”,结合经济指标与可行能力的相关指标;从“基本生活”“情感维系”“公共参与”“自尊与自我发展”四个维度提出旨在提升农村人口素质的可行能力清单。笔者认为,基本生活保障、健康的情感维系、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借助公立教育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平等公民”应具备的必要条件,也是评价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一) 基本生活

物质需要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生产生活的生存需要,物质需要的满足维持了个人或家庭的延续。这一需要在经济方面直接体现为人们的收入和财产。然而,仅有足够的收入并不能保证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的物质需要都得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的出行离不开便利的交通设施,人们的饮食健康离不开食品安全,人们身体的健康离不开必要的医疗服务,老年人的体面生活离不开必要的经济保障。因此,笔者主张从收入和财产,衣、食、住、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环境卫生五个方面来考察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

第一,收入和财产。(1)考察农村人口的收入状况,包括其收入是否达到当地的最低收入水平,是否具有购买维持生命所需物品的经济能力。(2)考察农村人口的财产状况,主要包括房产、人均宅基地和耕地、电视、洗衣机、冰箱、摩托车、轿车、牲畜等财产状况。

第二,衣、食、住、行。(1)“衣”的测量主要是考察农村人口是否有体面着装^③,着装的适宜度、干净度、换洗频率、购买衣服的频率,等等。(2)食物是获取充足营养的来源,也是保障农村人口正常发育、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这方面主要考察农村人口的食物中是否包括牛奶、鸡蛋、水果等营养食品,以及农村人口(尤其是小孩)食用垃圾食品的状况,以及食品安全的保障情况。(3)住房指标主要测度的是人均住房面积、室内装修、家具配置,等等。(4)在出行便利方面,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有巨大差异。“行”的测量关注的是乡村是否通公路,是否有公共交通工具及每天的频次,人们到学校、医院、集市、电影院、文化馆等

① 玛莎·C. 努斯鲍姆:《女性与人类发展》,左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4页。

② Elizabeth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109(2), 1999, pp. 287–337.

③ 所谓体面着装指的是使得人们能够自信地参与公共活动的着装。

地的平均距离，等等。

第三，医疗保险。中国医保体系划分为城镇职工、居民和农村合作医疗三个体系，每部分的筹资不同，提供的医疗服务也不同。医疗服务是人们生命延续的必需品，为了保证每个人平等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医疗资源应遵循按需分配的原则，而不是通过自由市场进行分配。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医疗服务筹集不到多少资金，主要依赖农民自己的缴费。这使得农村的医疗保险非常薄弱，而逐年增长的缴费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某些地区存在着农村人口大病返贫的状况。因此，考察农村人口享有的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有效可及”是评价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有效可及”指的是，在相关制度规定下，农村人口实际上能否获得新农合等医疗保险所提供的医疗服务。^①

第四，养老保险。目前，中国许多地区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已建立的地区也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老年人口日益增多。据统计，2018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2.4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2.6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跃升到18.7%。到202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3亿人，2033年左右突破4亿人，2053年左右将攀升至4.82亿人左右。^②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许多老年人在丧失劳动力后，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因此，考察农村养老的相关制度设计、缴费机制，以及农村人口能够享有的养老金的数值是评价农村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五，环境卫生。环境是生命体能够保持健康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一方面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另一方面其生态环境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目前，城市环境卫生已经引发了人们的重视，政府每年都会公布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文明城市等名单，而且会不定期对这些城市进行抽查和监督。地方政府会在环境卫生保护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农村地区的环境状况却没有应有的关注，环境卫生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差异。某些地区农村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在逐步在恶化，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放养式”的动物（如鸡、鸭、鹅、狗等）养殖所产生的动物粪便、四处排放的生活污水等问题越加突显，曾经清澈见底的河水已经变得浑浊不堪，还有农药的大量使用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鉴于这些情况，从人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角度来看，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应成为评价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情感维系

人们的健康生活不仅要求物质需要的满足，也依赖于情感需要的满足。而情感的维系又依赖于正常的亲密关系。通常来说，亲密关系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然而，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原本的人际关系受到了极大威胁。“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出现给农村人的心理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而这些心理健康上的威胁又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村老人自杀，青少年犯罪，未成年怀孕，等等。因此，考察农村人口情感维系的状况理应是评价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一，夫妻关系。（1）单身率。目前，“娶妻难”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难题之一。城市中是“剩女”比较多，而农村则是“剩男”比较多。“娶妻难”不仅是性别失衡的表征，也是农村地区相对落后，收入、教育等多重不利因素的综合反映。一些穷困的农村大龄男青年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情感和婚姻的满足，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引发“非常态的婚育行为”，^③甚至造成可能触碰法律底线的社会问题。（2）离婚率。当前某些农村地区早婚早孕现象比较普遍。许多年轻人早早步入婚姻，感情观、婚姻观尚未成熟，感情基础不牢固。结婚后，年轻人外出务工，受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一些年轻人由此而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从而不满于农村的婚姻状况，动摇了夫妻生活的感情根基。另外，一些夫妻长期异地分居，这一因素也导致了当前农村离婚率的提升。由此，单身率和离婚率这两方面的数据是考察农村人口夫妻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

第二，亲子关系。（1）留守儿童发生率。打工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某些地区，随处可见的留守儿童是乡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儿童缺少父母

① Elizabeth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109(2), 1999, pp. 287–337.

② 翟振武、陈佳鞠、李龙：《2015~2100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人口研究》2017年第4期。

③ 彭大松：《村落里的单身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的关爱和陪伴。还有一些家庭，父母离异，或者父母在外重新组建家庭，儿童则只能留守在祖父母身边。依据心理学的研究，在儿童的成长阶段，父母与儿童的长时间分离，会导致很大的心理问题，而这又会转变成社会问题。^①由此看来，留守儿童的发生会严重损害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对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2）未成年怀孕率。与留守儿童的问题相关的还有农村地区存在的未成年怀孕现象。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管教，许多农村孩子早早开始谈恋爱，甚至出现未成年怀孕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考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地区亲子关系的缺失。（3）留守老人发生率。家庭养老是当下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但年轻人更多关注的是其子女的学习，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却被他们所忽视。尤其是当留守在身边的孙子孙女也外出之后，子女基本上切断了与老人的感情联系。农村老人在经济上较少依赖子女的支持和帮忙，土地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常常是“活到老，劳到老”。而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心理上，缺乏子女的陪伴、问候和关心，许多农村老人都极为孤独。由此可见，留守老人的发生率也是考察农村人口生活质量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

（三）公共参与

人不仅是感情的动物，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②参与公共生活是人们的基本需要和正当要求。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公共生活可分为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类，官方的公共事务通常通过某种既定的机制展开，而非官方的公共事务通常发生在操场、公园等公共空间。笔者主张从公共空间的设置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两个方面来考察农村人口参与公共生活的情况。第一，农村人口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这部分考察下述制度情况：村庄集体事务的决策程序；村务公开状况；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机制和积极程度；农村人口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农民人大代表）；村民对农村事务的关注度、知晓度；等等。第二，公共空间的设置。这部分考察乡村中是否有广场、公园等大家交流和讨论的公共空间，面积有多大，利用率有多高等内容。

（四）自尊与自我发展

每个人都拥有自我发展的正当权利，这一点对于农村人来说也不例外。个人的发展建立在自尊自爱的基础上。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分离，这使得某些农村人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自卑心理。农村发展应该消除城乡隔阂，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给予农民获得自尊的社会基础。在自我发展方面，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以及充足而廉价的文化产品是农村人口发展各种能力的前提条件。由此，本文主张以“主观贫困”指数来评价农村人口的自尊程度，以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供给量来评价农村地区是否为人们提供了自我发展的公平条件。

第一，“主观贫困”（subjective poverty）。近年来，主观贫困成为测量贫困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③这一变量主要关注农村人口对自己所处阶层的主观认知，通过调查问卷，从心理层面测量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处于贫困阶层、中等阶层，还是富裕阶层的自我感知状况。

第二，教育资源。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口素质、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目前，素质教育已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方向。然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还停留在应试教育的阶段，教育资源的分配应尽力弥合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这一差距。因此，笔者主张将农村地区是否具备素质教育的基本条件作纳入到对农村教育资源的评价中，具体考察下述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村学校是否具备素质教育的相关硬件设施（如操场、钢琴、绘画工具、足球场等）；（2）农村寄宿学校的住宿环境，如洗浴、通风采光、温度、热水、装修及内饰等；（3）师资情况，主要考察在配备语、数、英主科老师的情况下，是否配置音乐、美术、体育、心理等专职老师；（4）学校辐射半径及校车配备情况。

第三，文化产品供给。文化产品的供给为自我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乡村振兴应该关注农村人口的文化生活状况，加大农村地区文化产品的供给。文化产品供给主要考察图书室、电影院、剧院、体育馆、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在农村地区的分布状况。例如，乡村是否有图书室，距离最近的电影院有多少公里，是否有流动的露天电影；小城镇是否有文化馆、图书馆等设施，等等。

以上设计的四个方面的 12 项指标可以归纳在下表中（见表 1）。

① 刘文等：《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基于评估及预防视角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4 页。

③ 梁士坤：《扶贫政策对农村主观贫困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0 年第 10 期。

表 1 中国农村发展的度量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具体指标
基本生活	收入与财产	是否达到最低收入线；资产（房产、人均宅基地及耕地面积、电视、洗衣机、冰箱、摩托车、轿车、牲畜等）
	衣、食、住、行	衣（适宜度、干净度、换洗频率、购买频率等）；食物（牛奶、鸡蛋、水果以及垃圾食品食用状况）；住房（人均面积、装修、家具配置等）；行（乡村是否通公路，是否有公共交通工具及每天的频次，人们到学校、医院、集市、电影院、文化馆等处的平均距离）
	医疗保险	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
	养老保险	养老金缴费机制，养老金数额，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
	环境卫生	生活污水排放、居住环境、路面整洁度、动物粪便、河流污染等
情感维系	夫妻关系	单身率；离婚率
	亲子关系	留守儿童发生率、未成年人怀孕率、留守老人发生率
公共参与	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	村庄集体事务的决策程序；村务公开状况；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机制、积极程度；农村人口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农民人大代表）；村民对农村事务的关注度、知晓度
	公共空间设置	乡村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的建设情况，公共空间的面积，公共空间的利用率
自尊与自我发展	主观贫困	农村人口对自己所处阶层的主观认知
	基础教育	农村学校基础设施设备（操场、钢琴、绘画工具、足球场等）；住宿情况（洗浴、通风采光、温度、热水、装修及内饰等）；师资情况（音乐、美术、体育、心理等专职老师的配置）；学校辐射半径及校车配备
	文化产品供给	乡村图书室、与电影院的距离、流动的露天电影；小城镇配置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设施状况

上述测量体系的制定参照了森等西方学者的能力学说，关注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以及各方面能力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指标体系并非试图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普遍性的测量和评价，而是针对中国农村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植根中国文化和历史背景而制定的评价体系。其目的在于提升乡村生活质量，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乡村振兴是农村产业、乡村文明、农业生态的全面振兴，是农村人口的全面发展。以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增强为标准来评价农村社会的发展，保护乡村环境，重新整合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资源配置，为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情感维系、公共生活和个人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多元分配正义”（20FZXB053）的阶段性成果，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6批面上项目（24M763634）资助。杨刚为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王胜强）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Measur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LI Shi, YANG Gang

Abstract: Amartya Sen and other scholars proposed the theory of capability, which believes that the co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enhancement of human capabilit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designed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apabilities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ability theory,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people-oriented.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Drawing on the capability theory of Amartya Sen and other Western scholar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rural areas, this paper formulates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to evaluate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basic life, emotional maintenance, public life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apabi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elimin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Key words: capability approach, basic life, emotional maintenance, public life, personal development